

目摇摇录

再版前言	雷永生 (员)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猿)
序摇摇言摇	(员)
第 一 章摇出身和族系·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贵族世界	(苑)
第 二 章摇孤独·忧郁·自由·造反·怜悯·怀疑与精神	
的冲突, 关于爱欲的沉思	(猿)
第 三 章摇第一次转向·探索生命的意义	(猿)
第 四 章摇哲学认识的世界·哲学的来源	(愿)
第 五 章摇转向革命和社会主义摇马克思主义和唯心主义	(员)
第 六 章摇世纪初俄罗斯的文化复兴与人们的交往 ...	(员)
第 七 章摇转向基督教·宗教的悲剧·精神的交往	(员)

第 八 章 摇 创造的世界 · 创造的意义和创造狂喜的体验	(员缘)
第 九 章 摇 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世界	(圆)
第 十 章 摇 流亡的年代	(圆)
第十一章 摇 我的最后的哲学 · 宗教 · 信仰 · 末日论的 世界 · 时间与永恒	(圆)
第十二章 摇 关于自我认识及其界限 · 自我鉴定	(圆)
第十三章 摇 沉重的年代 (员源年的补充)	(圆)
附：员源年的补充	(圆)

谨将此书献给我的挚友

叶夫捷尼亚·拉恩

再 版 前 言

雷永生

一九八四年底，我被从学院的马列主义理论部调到图书馆，做挂名的馆长。因此时间充裕，正好利用这个时机认真地多读些书，以便寻找令我迷惑的重大问题的答案。不久，刘小枫博士来信，约我翻译俄罗斯流亡哲学家别尔嘉耶夫的名著《俄罗斯思想》，并大力推荐这本书。我抱着试试看的心里，一边翻译，一边阅读。谁知越读兴趣越大，思想受到很大的震动，觉得这本书正是我所需要的，因为它回答了我心中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关于俄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和品格的精辟阐述，使我茅塞顿开。由此也使我对别尔嘉耶夫这个人的生平和学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在译完《俄罗斯思想》以后，又找到别氏的自传《自我认识》看了起来，并将之译成中文。这本书更加深了我对别氏的了解。后来，承蒙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将此书列入“基督教学术研究文库”，由上海三联书店一九八九年出版。但是，版权归香港基督教文化研究所所有。

《自我认识》出版后，由于内容精深和在一定程度上切合中国实际，所以受到读者的欢迎。但由于本人的水平有限，加上出版上的疏忽，书中出现了一些错译和错印之处，很对不起读者，自出版后就一直想补救，但苦于没有机会。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愿意再版此书，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

也同意授予简字版之版权，这样，经过修订的《自我认识》就可以问世了。在此，我向香港汉语基督教文化研究所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表示深深的谢意。

为了使再版与原版具有连续性，再版保留了刘小枫博士为原版所撰写的“中译本前言”。

尽管再版改正了原版的一些错译错印之处，但仍难免有错，祈望专家和读者指正。

二〇〇四年 八月 八日

中译本前言

刘小枫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英国剑桥大学拟颁授荣誉神学博士给一位同时代的基督教思想家，以志基督教思想界在本世纪初以来的混乱和残酷的时代中为维护自由、维护上帝之爱而付出的思想抗争。获得提名的有瑞士新教神学家卡尔·巴特、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和法国具天主教背景的哲学家马利丹。这三位思想家均著述丰富，在思想界功绩卓著，且分别传承了基督教思想的不同传统：卡尔·巴特传承路德的福音主义传统；马利丹传承托马斯·阿奎那的理智主义传统；别尔嘉耶夫则通过一种创造性的综合，传承了德国的思辨神秘主义和俄国的东正教神秘主义，并参与了基督教存在哲学的发展。

别尔嘉耶夫获得了剑桥大学的荣誉神学博士学位。这并非因为他的思想建构比另两位思想家更精深宏富——在思想的深度层面，这是无法比较的，这是因为，别尔嘉耶夫的思想活动有更为艰难的生存经历。

别尔嘉耶夫（1876—1935）是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俄国思想家，尽管在学院哲学界和教会神学界，他不是被忽视，就是受到指责，但在时代的思想风云中，被公认为是富有思想力度的大师，在二十世纪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别尔嘉耶夫早年就学于基辅大学自然科学系，曾因参与左翼政治活动而遭逮捕和流放；以后主要从事思想文化活动；十月俄国革命后曾任莫斯科大学哲学系主任，1929年被苏俄政府驱逐，

流亡柏林，以后又流亡巴黎。别氏的主要著述是在颠沛的生活状态中完成的；除著述外，别尔嘉耶夫还是俄国思想文化界的一位活动家和学术组织者：创办思想杂志、举办讲习班、建立研究所。无论在沙俄时代、苏俄时代还是流亡异国的政治—文化处境中，别氏都留下了著述，创办杂志、讲习班（或研讨聚会）、研究所的业迹。别氏在巴黎悦蓬邦寓世时的寓所，今已建立别尔嘉耶夫博物馆。

别尔嘉耶夫思想的突出特征，是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神秘主义之间的冲突：别尔嘉耶夫早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兴趣，不久便发生了思想转向：从马克思主义转向自由主义的哲学。值得注意的是，别氏的自由主义哲学与英美的自由主义哲学的理念基础不同，他的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是基督教的神秘主义。他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有“改宗”，但有“转向”。诚然，马克思的哲学也讲自由，但这种自由论的基础与历史唯物论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相关。别氏考虑的是：什么才是个体自由的切实的基础。在别氏的思想历程中，基督教思想一直是一个基本的结构性因素，并日益成为其思想的主要成分，其资源是从波墨、巴德到谢林的基督教的思辨神秘主义传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的俄国东正教神秘主义。从马克思主义到自由主义哲学的“转向”，乃是自由理念日益奠定在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传统之上。

别氏的思想经历了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前思想界的冲突时期、俄国革命后的独断时期和俄国流亡的思想时期，因此，他的思想包含着对时代的历史现实问题的深入广泛的反省。

本书是别氏晚年的思想自传，描述了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研究别氏的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本世纪初以来，俄国基督教思想在知识界突出的发展，学会、流派、人物和思想活动十分丰富，别氏作为俄国新基督教哲学的中心人物之一，活动和交往很多，他的思想自传也为现代俄国新基

督教思想运动史留下了丰富的史料，是不可多得的研究文献。

中译本系雷永生教授据俄文原文翻译，为方便读者，除人名外，尽可能减少俄文原文的附注。

1985年 缘月于香港隔田村

序摇摇言

很早就打算写这本书了。这本书的构思对我来说是特别的。描述自己的书通常是自我中心论的，在“回忆录”中这种自我中心论经常令人气愤，作者回忆其他的人和事，而更多的是说他自己。描述自己和自己的生活的书有几种写法。首先是“日记”，作者一年年、一天天地写，这是十分自由的形式，当今的法国人特别喜爱这种形式，阿米尔^①日记——这种形式的最有名的例证；最新的例证则是纪德^②的《日记》。还有“忏悔录”形式，奥古斯丁和卢梭对这种形式提供了最出色的典范。还有“回忆录”的形式。大量的这种著作作为历史提供了资料，赫尔岑的《往事与思考》是回忆录中最卓越的书。最后，还有一种形式，就是“自传”，它以编年史的结构叙述外部的和内部的生活事件。所有这些形式都想以或大或小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述说过去的生活，刻画往事，作者思想和感情当然与过去相连。我的书完全不属于这些形式中的任何一种。我任何时候也不写日记，我不准备公开地忏悔，我不想写关于我的生活和时代的事件的回忆录；我的主要目的不是那样的。我这本书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在

① 阿米尔（~~与康恩云雅德等合著~~ ~~员恩原书原译~~，瑞士日记作者，因他的一篇自我分析的杰作《私人日记》而闻名。这部日记从 ~~员恩~~ 年起记到他去世，被广泛译成外文，使阿米尔获得经久不衰的声誉。——译注

② 粤援纪德（~~与世则顾德~~ ~~员恩原书原译~~，法国作家，~~员恩~~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员恩~~ 年出版了到 ~~员恩~~ 年的日记的最后一卷。——译注

编年史结构中描述自己生活的自传。如果说它是自传，那么它就是哲学的、精神历史的和自我认识的自传。关于过去的回忆录永远不可能是消极的，不可能是精确的复制，那会引起对自己的怀疑态度。回忆是积极的，其中存在创造的、改造的成分。回忆的不准确性和不真实性是与此相关的。选择完成了回忆，许多东西被提升到第一层面，许多东西则被遗忘，有时是无意识的，有时是有意识的。我关于自己的生活 and 道路的回忆将是自觉的积极的，将是自己今天的思想和认识的创造性努力。在我的生活事实和描述这种事实的书之间存在着使我最感兴趣的认识行为。歌德给描写自己的书加上一个著名的标题：“我的生命的诗和真理”。但其中不完全是真理，它包含了诗人的创造。我不是诗人，我是哲学家。在描述我自己的书中，将没有想象，但将有关于自己和自己生活的哲学认识与思考。这种哲学认识和思考不是关于往事的回忆，这是现在时刻所完成的认识行为。这种行为的价值由其超越时间的程度，参与存在主义的时间即永恒的程度来决定。战胜带来死亡的时间，永远是我的生命的主旋律。这本书直率地和有意识地以自我为中心。自我中心论永远都存在令我嫌弃的东西，对此我这样来补偿：我把自己和自己的生活命运作为哲学认识的对象。我不想暴露灵魂，不想重新抛出我的精神的原料，按其意义来说，这本书是哲学著作，是贡献给哲学问题研究的书。它谈的是自我认识，是理解自己的需求，是对自己的面貌和自己命运的思索。被称为存在主义的哲学是这样的（我认为它的新颖之处被估计过高了）：它把哲学了解为关于人的存在的认识和通过人的存在而得到的关于世界的认识，在关于自身的认识中，人获得了在其他认识中仍被掩藏的奥秘。我感受世界、全部世界和历史进程、我们时代的全部事件，正像感受自己的微观世界的部分，感受自己的精神道路一样。在神秘主义深处，世界上所发生过的事情和从我这里发生过的事情有共同的起源。在那里，我

和自己主要的矛盾气质发生了碰撞。一方面，我体验我们时代的所有事件、世界的全部命运，如同体验从我这里出现的事件，体验个人的命运一样。另一方面，我又痛苦地感受到世界的异己性、完全的疏远性以及无法与它打成一片。如果我写日记，我相信，会在日记上经常写下这样的话：“这对我是格格不入的，无论如何我都感受不到与它的融合，一次再次地由于什么原因，由于超验而苦闷。”是的，由于超验，我全部存在都被苦闷所浸透。

我的生命经历了我的祖国和全世界的灾难性时代。我目睹了整个世界的毁坏和新世界的产生。我观察到人类命运的异乎寻常的转变，我看到了人们的转向、看风使舵和背叛，这可能是生活中最让人感到沉重的事，在过去所经受的考验中，我坚持住了自己的信仰，最高的力量仍然存在而没有毁灭，充满了如此之多的事件和变化的时代被认为是有意思的和有意义的，然而这个时代无论对个别的人还是对整代人来说，都是不幸的和痛苦的。历史没有宽容人类的个体，甚至没有发觉他们。我经历了三次战争（其中两次可以称作世界性的）、两次俄国革命（小的和大的），经历了 20 世纪初的精神文化复兴，以后则是俄国共产主义，世界文化危机，德意志的巨变，法国的崩溃和它的战胜者的占领；我经历了放逐，而且放逐还在继续。我痛苦地体验了反对俄罗斯的可怕战争，我也不知道世界的震荡如何结束。对于哲学来说，经历的事件过于多了：我坐过四次牢，两次在旧制度下，两次在新制度下；被流放到北方呆了三年；险些被永远迁移到西伯利亚；被从自己的祖国驱逐出来，而且我相信，我将在放逐中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同时，我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从事政治活动的人。我和许多人有关系，但实际上从深处说我不属于任何圈子，除了自己的创作以外，我完全不为别的什么作贡献。我的本质深处一直属于与众不同的东西，对社会问题我不仅不是漠不关心，

而且十分为其忧心，我有“公民义务”感，不过，在实质上，在更深的意义上说，我是非社会的，一直不是“社会的”，社会的学派任何时候都不承认我是他们的自己人，我一直是**以精神为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和“个人主义者”**。

我的书在写作上是自由的，它不是以系统的计划连结起来。其中有回忆，但这不是主要的内容，书中，对事件和人的回忆与思考相互交错，但思考占据了更多的地位。我没有像通常的自传那样，严格地按编年史的顺序划分本书的章节，而是按照主题和使我终身受到折磨的问题划分章节。不过，时间的连续性也有一定的意义，最大的困难在于，同一问题在不同章节中可能会重复，对此的惟一解释是，同一主题是在另一种联系和另一种境况中重新出现的。我决定自己担任这一工作，不仅是由于要体验自我表露的需要，留下自己面貌的痕迹，而且是因为这能促进人和人的命运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可以促进对我们的时代的理解。同样，还存在说明自己的矛盾的需要，书的这种类型是与人的最隐秘力量相联系的，是与记忆相联系的，记忆和忘却相互交错，时间中的许多东西我忘却了，很多人从我的意识中消失了，但却在更深之处保存了下来。忘却常常使我苦恼，有时我忘却的不仅是有一定意义的事件，而且是在我的生活中起了一定作用的人。我一直认为这是不道德的。在记忆中有复活的力量，记忆希望战胜死亡。当我重新忆起被遗忘的事情时，在那一瞬间，这种回忆具有积极——改造的性质。我并不是那种面向过去的人，我是面向未来的。对我来说，过去有着孕育未来的意义，面向过去的人所固有的忧伤状态，不是我所具有的。比起忧伤来，我所固有的苦闷完全是另一种状态。比起抒情型的人来，我更是一个悲剧型的人，这应当在我的自传中留下印迹。当我思考自己的生活时，就会产生这样的结论：我的生活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形而上学的生活，它被过多的苦难和悲剧事件（个人的和社会的）所困扰。

我探索真理，但我的生活是不聪明的，在生活中不是理性占统治地位，而存在着过多的非理性的不合理的东西。我的生活的光明时期和比较阴暗的使我受折磨的时期相互交错，高涨时期和低落时期相互交错。但是，无论在任何时期，我也没停止过紧张的思维和探索，我最希望使自己生活中的光明和创造的时期复活，对于生活中全部有价值的东西，我希望记忆能战胜忘却。但是，我将很少谈到对我的个人生活和我的精神道路具有最大影响的人们，这是被我有意识地排除掉的惟一内容。不过，为了永恒，记忆将最多地保持这些。将自己的全部创作都贡献给时间问题的马塞尔（马塞尔·莫兰）在他已完成的《追忆过去》（《追忆过去》）中说：“我太过沉溺于在实际中达到实质的自我，这徒劳无益。”这些话我可以拿来作我的书的题词。马塞尔所说的这些正是我的全部生活的体验。因为最不坦率的人企图自我揭示，便使我的书在结构上出现了矛盾，这是很困难的。非连续性不允许我讲很多在我的外在生活和内在生活中起了巨大作用的很多人。

表述从与其他人的心灵交往而获得的积极价值是困难的，表述生活中潜藏的悲剧也是困难的。尽管在我身上有西方的因素，我自己感到仍然是属于探索真理的俄国知识分子。我继承了斯拉夫主义者和西方主义者的传统，恰达耶夫和霍米亚科夫、赫尔岑和别林斯基，甚至巴枯宁和车尔尼雪夫斯基（尽管他们世界观上是有区别的）等人的传统，最后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和费多罗夫的传统。我是俄罗斯的思想家和作家。我的普济主义，我对民族主义的敌视——这都是俄罗斯的特点。此外，我意识到自己是一个承认社会主义真理的贵族阶级的思想家。我甚至被称作“社会主义的贵族主义”的表述者，用最朴实、最直爽而无人工掩饰的方式写作此书的愿望指导着我，那些带着回忆录性质并且是自传的材料被我写得枯燥无味，而且常常是提纲式的。书的这些部分，是为了描述不同的环境（通

远

过它们我走入自己精神的历史之中) 的需要。但是, 书的主要部分不是这些, 而是自我认识, 自己的精神和精神探索的认识, 我感兴趣的主要不是描述环境, 而是描述我对环境的反应。

写于悦道书斋

第一章

出身和族系·我与世界环境 第一次推动·贵族世界

我的出生只能部分地加以理解，并给以理性的说明。个性的奥秘，它的惟一性，无论谁也不可能最终地弄清楚。人的个性比世界具有更多的神秘性，它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人是微观宇宙，在自身中包含着一切。不过，在人的个性中具有现实意义的和形成外观的仅只是个人——特殊的东西。同时，人是多层次的实体。我一直感受到自身的这种多层次性。对于诞生于其中的实体世界的第一个反应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不能记得由于和我异己的世界相遇而发生的第一声叫喊，但是，我毫不动摇地知道，我从一开始就感觉到自己陷入一个和自己格格不入的世界，在生命的第一天和在生命的现在的日子，都同样感觉到这个。我一直仅仅是一个过客。基督徒应当自我感觉的不是这里有永存的城市，而是城市在未来将受到惩罚。不过，我在这里所描述的最初的感觉，我并不认为它是基督教的善行和成就。有时我认为，其中甚至存在某种不好的东西，在世界与生命的关系上存在某种损伤。那种扎根于地上的感觉对我来说是格格不入的，我较多地具有俄耳浦斯教派关于灵魂起源的了解，认为它是从最高的世界向低的

世界的降落，“地上无聊的歌声不可能代替天上的声音”。

我一直没有来源于父亲和母亲的感觉，永远也没有感到双亲是生我之人。不喜欢所有的亲属——这是我的特性。我不喜爱家庭和家庭生活，我破坏了西方民族对家庭基础的眷恋，一些朋友开玩笑说我是人类的敌人。这是由于我的人性的极为特别。我一直不喜欢特征、面貌上的相似，不喜欢孩子与双亲、兄弟与姐妹之间面貌的相似，为此而备受折磨。对我来说，种族在特征上的相像与人的个性的尊严是矛盾的。我喜爱的只是“非一般神态的人”。但是，如果认为我不爱父母，那就错了，相反，我很爱他们，认为他们是好人。但是，对于他们，我宁可像父亲对待孩子一样地关心他们，为他们生病担忧，被他们会死的念头折磨得很痛苦。为人之子的感觉我一直很弱，对我来说，任何事物都不能说是“母亲的胸怀”，无论是我自己的母亲，还是大地——母亲。我的母亲很美丽，人们甚至把她看做美人。在 18 岁时她依然是个美丽的妇人。但我一直未能发现自己有任何的俄狄浦斯情结（弗洛伊德依靠它创造了万能的神话）。双亲一直对我倾注了特殊的全部的钟爱。我却认为，钟爱的对象应当是遥远的、超验的，和我不相像的，“美丽的王后”崇拜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是 19 世纪初俄罗斯的浪漫主义者。

按出身来说，我属于贵族世界，这在我心灵意识上打下烙印，大概不是偶然的。我的双亲不只是属于贵族社会，而且属于“文明”社会。在家中我们主要用法语交谈。双亲在贵族中有很多联系，特别是在我的生活的前半期，这些联系部分是由于家族的关系，部分是由于父亲在近卫重骑兵团服务。小时候我就知道，父母是对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有很大影响的皇室总侍从长柯楚别依公爵的朋友。与亚历山大三世同样很接近的宫廷卫戍司令切列文将军则是我父亲的近卫重骑兵团时的同事。从父系来说，我出身于军人家庭。所有我的先辈都是将军和获得乔治十字勋章的

军人。他们最初都在近卫重骑兵团服役。我的祖父叶利谢耶夫是顿河军的长官。曾祖父叶利谢耶夫上将是诺沃罗西亚（新俄罗斯）^①的总督。他与保罗一世的通信刊登在《古代俄罗斯》上。我的父亲是近卫重骑兵团的军官，但他很早就退伍了。在第聂伯河岸边的奥布霍夫自己的庄园定居。一个时期成了贵族的领袖。土耳其战争期间重新到军队中服役，然后做了叶利谢耶夫年西南地区土地银行的主任。他没有任何追求功名的兴趣，甚至辞去由于担任叶利谢耶夫年多的优秀的名誉法官而应得的官衔。我从童年起就因先辈的功业而被列为帕依（Паж）^②。由于我的双亲生活在基辅，我便进入了基辅的士官武备学校。但为我保留了在高兴的时候转到帕依中等武备学校的权力。我的母亲是库达舍娃公爵小姐，她是半个法国人，她的母亲——我的外婆是舒阿吉莉伯爵夫人。实际上，与俄国人相比，我母亲更像一个法国人，她受的是法国教育，在很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巴黎，她用法文写信，写得非常好，但一直不肯学习比较熟练地用俄文写信，按出身来说她是东正教徒，但她自己感到更是一个天主教徒，并且一直按法国天主教的祈祷文做祷告。我开玩笑地对她说，她永远不能对上帝改称“你”。有意思的是，我有一个作女修道士的祖母，她生于巴赫美契叶夫，还在我祖父活着时就秘密地剃度了。她和基辅的彼切勒斯基修道院很接近，著名的长老帕尔菲尼是听取她忏悔的神甫和朋友，他完全决定了她的生活。童年时的印象我还记得。当祖母逝世我去参加葬礼时，我才六岁，当我看到她穿着女修道士的服装躺在棺材里并按女修道士的仪式下葬时，很是吃惊。修道士走来并且说：她是我们的。我母亲的祖母库达谢娃公爵夫人，在丈夫去世后成了真正的修女。在苏维埃时期我的家里

① 指旧俄黑海和亚速海沿岸地区。——译注

② 旧俄贵族子弟军官学校学生。——译注